

章太炎思想研究

唐文权
罗福惠 著



章太炎思想研究

唐文权 罗福惠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章太炎思想研究

唐文权 罗福惠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42万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4,500

书号11406·01 定价：(精)4.60元
(平)3.80元

(黑排胶印)

序 言

今年是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热爱祖国、学问淹博的历史伟人，我校特地出版唐文权、罗福惠两同志合作的这本新著——《章太炎思想研究》。

以往有关章太炎思想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本书作者则力图比较全面、客观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加以详尽地考察与剖析。由于章氏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而又极为复杂，作者便给自己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们在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同时，必须对中外学术思想史也有所涉猎。作者不畏艰难，辛勤耕耘，在认识论、佛学、经学、道德学说等难度较大的领域都作出可贵的努力。当然，我并不认为作者的各种学术见解已经臻于成熟，其中必然存在许多可以商榷以至进一步校正之处，但这种敢于披荆斩棘、探幽索微的勇气毕竟是值得尊重的。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章太炎的研究路子比较狭窄。他在辛亥革命前的民主共和鼓吹诚然值得表彰，辛亥革命后的渐入颓唐也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综观章氏一生，他的主要事业是在学术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学术方面。他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家，特别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光荣，也有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落伍，但终其一生他却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章太炎对于祖国的爱是浑厚而又深沉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以至整个生命与振兴中华结合起来，与争取民族独立、追求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他强调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但在继承传统

文化时并未忽略对其陈旧部分的批判。他反对“全盘西化”，但在融会中西文化方面却支付了极大的精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他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勤奋汲取新知，其涉猎之广、钻研之深、见解之锐敏，每每令人叹为观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新的高度上总结两千余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融铸各家、会通中外，蔚然成为一代宗师。当然，他的批判和抉择能力都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因而其学术思想体系存在缺陷与失误亦多。但是正如历史上一切卓越人物都不可能是白璧无瑕的完人一样，我们也难以要求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十全十美。无论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多少歧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章太炎在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章太炎给我们留下一笔尽管瑕瑜互见然而毕竟是丰富多采、光华夺目的巨大文化遗产。以他的学识渊博、思想恢阔、见解深刻和影响深远而言，完全可以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也许是由于我们国家太大，历史太久，杰出人物太多，过去我们对于章太炎这位大师的历史价值并没有给以足够的发掘与估计。当然，章太炎自身文字的艰深也妨碍了中外人士对他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理解。我深深相信，通过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必将有力地推动对于章太炎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对于建设新的民族文化体系，无疑是很裨益的。

殷切地期待着本书作者和其他章太炎思想的研究者，将有更多更好的新作问世。

章开沅

丙寅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 言	章开沅
第一章 在新旧思想文化的交接点上	
——绪论	(1)
章太炎思想产生的时代和地域背景	(1)
章太炎思想的主要特点	(10)
章太炎思想的历史地位	(21)
第二章 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	
——章太炎前期西学吸引	(28)
宇宙·生物·社会	
强调变易发展新精神的进化观	(29)
自卫·自贵·自强	
突破“华夷之辨”旧范围的种族观	(47)
第三章 富国足民 抑富振贫	
——章太炎的经济思想	(64)
未出改良范畴的经济思想	(64)
别有民生特色的经济思想	(79)
第四章 “县群众、理民物”	
——章太炎的政治学说	(100)
维新时期的政治学说	(100)
过渡阶段的政治学说	(104)
对“国权论”和“神我宪政说”的批判	(106)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摄入和抛弃	(113)
对代议政治的商讨	(116)

“二次革命”中的前却进退·····	(126)
从统一到分治·····	(137)
第五章 “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	
——章太炎的认识论·····	(147)
机械唯物的思想倾向·····	(148)
唯物主义的逻辑认识·····	(158)
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	(172)
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	(188)
第六章 不立一神 有益生民	
——章太炎的宗教观·····	(211)
基于爱国救亡立场的宗教批判·····	(211)
本于民主革命原则的宗教批判·····	(224)
第七章 西来之风 应机而化	
——章太炎的佛学思想·····	(238)
早年对佛学“不能深”“不甚好”·····	(238)
中年以后“乃达大乘深趣”·····	(243)
鼓吹建立以唯识为宗的“新”宗教·····	(250)
以唯识思想进行的“判教”工作·····	(255)
无政府主义思想汇入后虚无思想的浓厚·····	(260)
老庄思想汇入后虚无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267)
易孔思想摄入后“回真向俗”之迹渐显·····	(273)
佛儒联系加强后更趋“切于人事”·····	(285)
第八章 中国人“自然该守中国的道德”	
——章太炎的道德学说·····	(294)
服务于维新运动的道德学说·····	(295)
服务于“排满”革命的道德学说·····	(298)
“革命之道德”学说的应用·····	(305)
佛学唯识论的道德学说·····	(310)
“俱分进化”的道德学说·····	(319)

二重性的道德境界·····	(323)
回归为主张儒家道德·····	(324)
第九章 “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	
——章太炎的经学·····	(329)
学术渊源和起点·····	(329)
早年治《春秋》和《左传》·····	(334)
中年治《易》·····	(351)
晚年治《礼》·····	(359)
第十章 鉴古知今 昭识本末	
——章太炎的史学·····	(371)
封建史学的批判者·····	(371)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倡导者·····	(377)
熔铸中外的治史方法的探索者·····	(384)
资产阶级史学成果的贡献者·····	(393)
第十一章 弥补“学术缺陷之大端”	
——章太炎的诸子学·····	(410)
对周秦诸子的汲取时期·····	(411)
对周秦诸子的批判时期·····	(420)
对周秦诸子研究的深化和转化时期·····	(428)
复归为儒道互补的时期·····	(447)
第十二章 “辨名实，知情伪”	
——章太炎对历代学术的初步总结·····	(453)
从“理性”的角度评论汉学·····	(453)
从“个性”的角度评论玄学·····	(459)
从“德性”的角度评论理学·····	(467)
从“民族性”、“民主性”的角度评论清代之学·····	(489)

后记

第一章 在新旧思想文化的交接点上

——绪 论

作为绪论，我们拟就章太炎思想的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作一概述，以为全书纲领。

章太炎思想产生的时代和地域背景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思想文化也是这样，它们固然共同根源于社会实践，但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我们研究章太炎思想，既要考察社会经济变化这方面的根源，把握这种变化如何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制约其思想的发展，又要注意他的思想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把握它与过去的和外来的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关系。我们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全面把握章太炎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

章太炎思想是特定的时代产物。

出生在1868年的章太炎，恰与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实行维新同岁。这一年，离开天京陷落，风雨骤歇的悲壮激烈的日子仅有四年。中国革命刚刚转入沉寂的低潮阶段，而喧嚣一时的“同光新政”——洋务运动又勃焉兴起。朝野人士侈论洋务，高谈“富国强兵”。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

是，事与愿违，相随而来的是中法之战、边疆危机、中日之战、瓜分狂潮。中国社会日益沉沦。因此，青少年时代的章太炎，耳之所接，目之所击，除却案头高高堆迭的古代经籍，就莫过于怵目惊心的列强侵略、屈辱条约和充斥耳目的富强之计、格致之学这类“窗外事”了。尘封蟪蚀的三坟五典引导他走乾嘉学者一意治经的道路，狂暴袭来的欧风美雨又刺激他关心国事留意时务。用他老师俞樾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在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①。动荡的时代一下子就把章太炎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东方的古圣和西方的近贤都在对这位绝意仕进、好学深思的青年学者招手微笑。

章太炎终于选择了一条对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文化兼收并蓄改造制作的曲折道路。

风雨如磐的时代就象一个巨大无比的磁场，在它的强大感应之下，那些被发掘出来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矿藏，几乎无一例外地释放出超常的能量，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就以倡导并力行“经世致用”口号的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位明末启蒙思想家为例，他们的进步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以及一新耳目的治学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真正发生作用还是在清末。紧急的时代课题促使先进的人们在这口号中注入新的内容。顾炎武等反对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被用来激起人们痛恨这种束缚思想锢塞人心的恶劣制度；他们反抗清政权的悲壮行动和言论，被用来激起人们的民族意识；他们抨击君主专制暴政，被用来激起人们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向往……所以，康有为、梁启超之崇拜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的影响，章太炎仰慕顾炎武之为人，并改名绛，别号太炎，都不是偶然的。用当事者的切身感受来说，明末“三老”的话就“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②。

① 俞樾《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序》，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4页。以下简称《年谱长编》。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

在章太炎长达四十余年的思想历程中，率先师从并引起他无限信从的便是这几位“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语）作为特征的启蒙思想家。以此为契机，章太炎毕生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传统的思想文化不断从事“点铁成金”式的改造制作。事实确也如此，随着时代的需要，丰富多采的传统思想文化源源摄入，成为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宝库，新思想萌发的重要来源。所以，他在晚年《说求学》一文中将“求学之道”归结为“求是”和“应用”，并肯定当前中国“应用”先于“求是”，其自觉继承“经世致用”优良传统以服务时代所需之意至明。

谈到章太炎与西学的关系，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七十年代至戊戌以前西方新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在这时期，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通过前期改良派人物的宣传鼓吹，西学东渐的速度正在加快。可以说，自明代利玛窦等输入西学以来，时断时续传播极缓的西学至此方进入一个比较顺利的长入时期。而这种加速长入又同清末译书和新式学堂的传播之劳分不开。

清末译书以京师同文馆（1862年）、江南制造局（1865年）和广学会（1887年）三处为重镇。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甲午战前二十余年间，上述三处共译书约三百种，其中科技书籍为二百多种。章太炎的统计要宽一点，鸦片战争以来所译书籍共约四百种^①。江南制造局从1868到1879年共销售书籍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一部，地图及海道图四千七百七十四张。广学会1893年售书额为八百元，1895年增至两千元，1898年更激增至一万八千元。清末新式学堂肇始于洋务派所设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自强学堂等，由于数量极少，影响有限。但传教士一意经营的教会学校却在此时加速渗入内地城镇。自鸦片战争到十九世纪末，六十年间教会在华办学可分三阶段：前二十年估计有学校二十所，学生一千人；中间十五年，学校增至八百所，学生两万人；后二十五年，有学校两千所，

^① 章太炎《译书公会叙》1897年，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4页。以下简称《政论选集》。

学生四万人^①。

洋务派和传教士的辛苦经营当然是各有心肠，对于他们的西学传播之效应该有一个冷静的估价。首先，当时所译关于科技和政事之书大多属于在西方业已过时的浅近读物。西方政学，“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人视之，已为陈言矣”^②。并且由于当时学贯中西的译者尚少，翻译常以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受的方式进行，很难确保译作的准确性。再加上译者人自为政，急功近利，译书大抵零星散乱无计划。至于洋务派所办新式学堂，常因官僚腐败，督理非人，教习充数，而难以培育新式人才，教会所办又散发浓厚的宗教气息。可见由于旧思想旧文化在中国长期处于优势，少量的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外来思想文化的介入还远远不能改变中国的状况。

尽管这样，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行程却不断证明，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一旦移入新域，它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展的客观规律，往往不依主持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它的客观效果也并不与输入的数量成正比。在输入的客体和接受的主体二者之中，后者的感应能力对加强振荡强度的重要性似乎更重要些。因为在主、客体交往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同化、异化作用，会使得反馈后的效应扩大许多倍。因此，不难理解，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壤中的渐见萎黄的本土思想之树，何以在十九世纪末呈现复苏状态，绽发新芽，宛然风姿绰约了。无论是岸然挺生的正枝，还是横逸斜长的旁条，透过它们的表皮，我们总可发现一种新的养液脉脉输导其间。同时也不难理解，有识之士何以对东渐的西方思想文化称颂不置，以致到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思想终于发展成为一种颇有社会影响的思潮，而不再局限于个别人物的孤独的沉思或寂寞的呐喊。于是，在万木草堂别出心裁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中，多少沾寻了新式教育的影响；在戊戌时期思想界巨子的哲学论文中，可以经常见到西方近代科学的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6—228页。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名词术语。华蘅芳所译《地学浅释》（1873年）和李善兰、徐建寅所译《谈天》（1881年）中所介绍的地质、天文和生物等领域中的进化变易观念，能够成为日后维新志士政治改革工程的有效建筑材料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会融合，必然氤氲化生一代新人。应该说，章太炎有幸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左右采获，从而构筑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同时代其他进步思想家一样实受时代之赐。

然而，章太炎思想又是近代江浙经济和江浙文化这一特定地域环境的产物。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近代统一的国内市场又远未完成，因而思想文化的地域性历来表现得非常突出。章太炎对此知之甚谥，所以《馥书》首篇《原学》就把地理环境列为思想文化三大要素之一。春秋战国时代赵、楚、齐三大地域文化思想面貌不一，宋明理学濂、洛、关、闽、姚江、泰州各派有别，清代经学吴、皖有分，这些因地域而产生的差异，常为章太炎论及。尽管《原学》认为随着近代社会交通的发达，地理环境对思想文化的影响将逐渐减弱，但实际上地域特色并不会因此很快消失。

在近代，江浙经济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商品经济的成分较多。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削弱了封建势力，一部分地主的逃亡及对传统土地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得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从经营土地转入经营工商，从而增添了工商资本的实力。所以，甲午之后，恩格斯那段著名的预言似乎更适用于江浙地区：“中日战争标志着古老中国的结束，标志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的全面革命（即便是逐渐进行的革命），这包括农村的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古老的纽带被大工业、铁路等等的破坏”^①。事实确实如此，江浙地区的民族工业在甲午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就以杭州湾地区而言，战前仅有三家近代企业，这就是1885年浙抚刘秉璋以官银十万两创办的“浙江机器局”，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4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364页。

1892年建立的拥资两万元、雇工三十人的“石印厂”，与另一拥资十二万元的“戴生昌轮船公司”。可是战后1896、1897两年间，杭州即办起缫丝厂三家，纱厂一家，资本达一百零三万元（其中一家缫丝厂资本数不明）。以宁波为例，1887年李鸿章幕僚严信厚以资本五万两创设拥有工人三、四百名的“通久源轧花厂”，不过十年，他又建立资本四十三万元、工人七百五十名的“通久源纱厂”。到1906年，更有顾钊另建“和丰纱厂”，资本达八十四万元，工人一千八百名。在杭州肘腋之下的肖山，1895年有“合义和丝厂”一家，资本二十四万元，到1899年，该厂老板楼景晖又创办“通益公纱厂”，资本五十六万元，工人一千一百余名^①。从1895到1913年，全国总计设立厂矿五百四十九个，资本共一亿二千零二十八万元，其中杭州十三个，资本额一百五十五万二千元。从1895到1910年，全国华商纺织厂十九家，资本共一千零四十五万四千元，其中浙江四家，资本二百三十五万一千元。一批腰缠百万的浙籍资本家崛起在杭州湾：慈谿严信厚，拥资八百万；镇海叶澄衷，拥资八百万；奉化朱志尧，拥资三百万；吴兴庞元济，拥资二百九十万^②。杭州湾地区办厂规模之大，资金之多，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引人注目的。这些实力雄厚的工商金融界大亨，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但对浙江地区，对国内其它地区的经济生活也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把目光从杭州湾再向北移，那么，正好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联成一片。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南通等通都大邑都是当时近代工业的精华所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摇篮。轧机声闯入耳鼓，洋纱洋布披上身体，火车轮船替代舟车，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注定要影响该地区的思想文化，也注定要触动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心弦。章太炎不是出生在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环境之中，而是生活在近代经济生活节奏较一般为快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又是他的大幸。

^① 资料来源：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二辑。

^② 据章开沅《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计算。

谭嗣同曾提出革新文化、启迪民智有“三要”：一曰创学堂，二曰建学会，三曰办报纸^①。这“三要”其实又是衡量各地新思想新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尺。我们不妨据此来考察一下浙江的情况。

浙江的学堂发展较快。1897年，杭州设立“求是书院”、“武备学堂”，次年开办“蚕学馆”，又次年办“养正书塾”。这些学堂内设置中文、英文、东文、算学、理化、舆地、体操、图画、兵器、地形、测量等新式课程^②。进入二十世纪后，新式学堂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单是与光复会有渊源关系的就可以报出一大批来：嘉兴小学、竹林小学、绍兴大通学堂、中西学堂、越郡公学、热诚小学、绍兴府中学堂、东湖学堂、云和先志学堂、杭州赤城公学、临海耀梓体育学堂、余姚三山蒙学堂、丽震两等学堂、竞成商业学堂等等。这些学堂既是浙江地区文化教育发达的产物，也是培养人才、传播新思想文化的重要场所。

浙江的学会办得很有起色。1896年浙人罗振玉、徐树兰等在上海组织“务农会”，计划筹款购田在江浙地区试办垦殖事业，次年该会又创办《农学报》，先后译出农学书籍一百余种，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学会。在该会倡导下，浙江各地颇有成立分会者，如瑞安设“务农支会”，海宁设“树艺会”。1897年，章太炎与同志数人在杭州发起“兴浙会”，自称与吴、楚、岑南等地学会“意趣大同”^③。

浙江的报纸也办得很有成绩。1894年《杭报》创刊，次年旨在“鼓吹新政”之《杭州白话报》发刊，1897年，“以鼓吹革命为宗旨”之《平湖白话报》发刊，同年章太炎、宋恕、陈虬等编辑的《经世报》在杭州问世。维新时期，讲求时务的报刊在浙江的政治生活中很有影响，以致官方一度下令派销。浙抚廖寿丰特购《时务报》分派各州县，并谕全省文武及书院诸生“披览”，杭州知府林启继以特札飭属下购阅《知新报》。

① 《谭嗣同全集》第41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浙江潮》1903年，第8期。

③ 章太炎《兴浙会序》，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第16页。

值得指出，章太炎本人就是开风气之先的“三要”的积极鼓吹者和力行者。他把新式学堂的建立视为变法之本，“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①。他又视学会有大益于中国，可以“昌吾学”，“强吾类”^②。至于报纸，他更把它当作近代最见成效的宣传工具，“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③。戊戌时期他即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参加了《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实学报》、《正学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

浙江是卧薪尝胆、报仇雪耻之乡，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在明末，顾炎武、张苍水等东南志士的艰苦撑持，使浙江成为反清武装斗争最激烈、坚持最久的地区之一。清政权建立以后，浙江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又表现得异常突出。清初几起著名的文字狱，如庄廷钱明史之狱，吕留良选文之狱，查嗣庭试题之狱，汪景祺作诗之狱，齐周华刻书之狱，当事者统统是浙籍人士。血腥的株连使大批浙江知识分子遭到惨酷的迫害。生于斯土、长于斯土者不能不对此记忆尤深。章太炎十三岁时就对此“甚不平”，陶成章《浙案纪略》把它当作浙江近代革命活动的远因，表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政治中的心理和地理因素一旦激发，就能风发泉涌造成局面。1895年“公车上书”时，各省举子一千三百余人联名相署，“独缺吾浙一省”^④，浙人引以为耻。三年后，浙江知识分子大步前进，必须刮目相看。1898年春，浙人徐珂、章献猷、陈虬等十九人在京签名参加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该会“题名记”共录一百八十六人，浙人占十分之一，仅次于陕西（三十四人）和广东（二十七人），居第三。随后旅京人士又踊跃组织“保浙会”，显示了浙江知识分子勃兴的政治热情。人们常以湖南在戊戌时期新学发达，人物峥嵘，气象辉煌，而

① 《变法箴言》1897年8月，《政论选集》第22页。

②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年3月，《政论选集》第12页。

③ 《实学报叙》1897年8月，《政论选集》第29页。

④ 袁祖志《〈公车上书记〉序》。

誉之为“小法兰西”。其实，在全国各省区中，浙江所涌现的一批维新名士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暂且不论在沪办《时务报》的钱塘汪康年在津与严复创办《国闻报》的夏曾佑，以及在京供职的张元济，以下略举在乡梓努力经营者：

平阳宋恕，1891年写成《六斋卑议》，凡四篇六十四章，主张仿效英、德、美、法诸国，开设议院，发展近代工业，鼓励民间投资集股购置机器，又主张创建各种学会。在他担任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时，积极介绍西学，鼓吹维新，在学生中很有影响。他与谭嗣同、章太炎交情很深，《仁学》书稿即由他1897年“见示”章氏。

乐清陈献宸，养正书塾汉文总教习兼历史教师，教学中宣传新思想，叫学生“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①。1902年，与养正书塾退学学生创办《新世界学报》，言论颇有锋芒。章太炎认为他对新学颇有见解，“持论稍实”^②。

乐清陈虬，1892年著《治平通议》八卷，鼓吹变法图强，提出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等主张。1897年与章太炎、宋恕同任《经世报》撰述，次年参加“保国会”，在温州创办“求志社”、“心兰书社”、“利济医院”、“利济学堂”、“瑞安演说会”等。

山阴汤寿潜，1890年著有《危言》四卷，内容也是主张变法。该书曾因“帝师”孙家鼐“进呈”光绪，有命“留心阅看，采择施行”，而身价陡增。

山阴蔡元培，1898年担任“中西学堂”监督，在校支持信奉进化论的新派教员，次年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时又宣导学生研求科学，力劝诸暨丽泽书院改为新式学堂^③。

他如归安钱恂、钱塘孙宝瑄、诸暨蒋智由、海宁王国维，也都是——时之佼佼者。

①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12页。生活书店1947年版。

② 《太炎先生年谱长编》1897年条。

③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1898、1899年条。